

“变体论”与话语体系建设新思维

“Variant Theory” and the New Perspectiv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Discourse System

李国辉 (Li Guohui)

内容摘要: 自从中国文学话语的失语现象被提出以来,学界的主要应对是回归传统诗学,可以将其命名为“寻根论”。对此,蒋承勇提出中外融合、文明互鉴的新路径,可以将其命名为“变体论”。“寻根论”的局限在于:当下文学话语体系的语境与功能已与传统话语体系显著不同,原样回归传统势必遭遇困境;相较之下,“变体论”为话语体系的构建提供了新思维,它既认同一个世纪以来中国文学话语体系的探索,有开阔的文化胸怀,又肯定中外文学话语相互交流中发生的变异,认为这种变异中蕴含新的可能性。

关键词: 话语体系; 蒋承勇; 变体论; 变异

作者简介: 李国辉,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比较诗学、象征主义文学思潮。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9世纪欧洲文学与科学关系研究”【项目批号: 23&ZD303】的阶段性成果。

Title: “Variant Theory” and the New Perspectiv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Discourse System

Abstract: Since the phenomenon of “Aphasia” in Chinese literary discourse was put forward, scholars have sought solutions by returning to traditional poetics, which can be named the “Root-Seeking Theory.” In response to this tendency, Jiang Chengyong proposed a new perspective of integration between Chinese and foreign cultures and mutual learning among civilizations, which can be named the “Variant Theory.” The “Root-Seeking Theory” has some flaws. Today,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literary discourse system is different from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discourse system in terms of context and function. A simple return to the traditional discourse faces great difficulties. The “Variant Theory” provides a new way of thinking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literary discourse system. It not only validates the exploration of the Chinese discourse system over the past century with an open cultural vision, but also affirms the variations that occur in the mutual exchange of Chinese and foreign literary discourses, believing that these variations contain new possibilities.

Keywords: discourse system; Jiang Chengyong; Variant Theory; variation

Author: Li Guohui is Professor at the School of Humanities,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Jinhua 321004, China). His academic interest includes comparative poetics, Symbolist literary trend (Email: liguohui79@163.com).

自从中国文学“失语”的现象被提出以来，学者们一直在思考构建中国文学话语体系的方式，其中一个倾向非常显著，就是回归中国传统文学话语。在此背景下，中国古典文学理论的关键词、批评方式成为热点。¹回归传统文学话语的倾向可以命名为“寻根论”。就像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寻根文学一样，这种倾向试图从中国诗文评的材料中寻找批评方法。与此不同，蒋承勇提出一种新的思路，即古今并蓄、中外兼容。他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本土化现象作为类比，发现了理论变体的生命力：“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恰恰是本原性特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本土的‘变体’的呈现，通俗地说就是马克思主义与本土的实际相结合后的创新性接受、传播与运用，其间的‘变异’则意味着理论‘旅行’的创新效应，也是‘变体’之新理论的生命力与特色所在”（蒋承勇，“避免不同的‘失语’”47）。可以将这种说法简称为“变体论”。“变体论”与“寻根论”相比，既避免了一些思维上的狭隘之处，又面向20世纪以来的文学现实，具有更大的可行性，为中国文学话语体系的建设带来了新思维。

一、回归传统文学话语体系的困难

话语是文学理论的基本要素，在中国诗文评文献中，存在着一些历经多个朝代仍旧保持生命力的话语，例如余味、神韵、意境等。一些话语相互之间可以形成关联，并成为文学评判的标准。中国经学、子学中还有一些具有一定普遍性的思维方式，它们也可以用来支持文学的话语体系。易学中的思维方式，例如阴阳、对待，有利于解释具有显著变化的诗学现象。而与佛学、新儒家有关的体用同源等思维方式，也可以用来思考象征、直观之类的文艺问题。虽然如此，在实际的操作中，纯粹利用中国传统话语体系是非常困难的。

首先，我们今天提出构建话语体系这一主张所处的语境，与中国古人所处的语境不同。今天的话语体系处于现代学术的语境之中。中国的现代学术一方面主要“拿来”了欧洲的自然科学，另一方面又参考了欧洲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中国现在的学科设置、学术方法，基本上都可以在欧洲（含苏联）的近现代学术中找到源头。西方学术旨在对统一性或者内在结构进行思考，这种思考在历史学、文学、心理学等学科上都起作用。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在反思历史学时指出：“无论如何，在这些缓慢的历史层面，人们

1 参见李思屈：《中国诗学话语》，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91-224页；李建盛：“‘以意逆志’诗学命题的诠释学探讨：从汉代理解到当代阐释”，《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学报》5（2023）：52-71。

可以重新思考历史的统一性，就像它们位于一个下部结构之上。所有的阶段、所有上千种阶段，所有上千种历史时间的爆炸，都可以通过这些深度、通过这种半固定状态加以理解。任何事物都在它的引力下运动”（181）。这种对内在结构的崇拜和信心，可以用来概括欧洲的学术。

中国从晚清到民国，当然也包括现在，逐渐接受了欧洲的现代学术理念，并发展它、创新它。虽然在不到两个世纪的过程中，中国也出现了与欧洲学术不同的局面，但整体上看，中国的学术是从欧洲近现代学术生长出的一个新领域。这个领域的根基，同样是对统一性或者内在结构的探寻。这种根基与中国传统学术的根基是不同的。那么，中国传统学术的根基是什么呢？它不是寻找一个潜在的结构，而是以人为根据。以人为根据，就是不论经学、史学或者子学，都以人的经验、知识为尺度，用它来衡量是非、善恶、利弊得失。但是人的经验、知识是有限度的，它无法照亮经验之外的世界。西方近现代学术之所以辉煌，正在于其在人们的经验之外发现了声、光、电、磁的秘密。相较于自然科学，西方人文和社会科学的发展在这种思维下也有了很大进展，例如巫术思维的发现、无意识心理的探索、剩余价值理论的提出等。具体到文学理论上，像符号学、结构主义诗学可以视为其代表。正因为感受到中国传统学术无法与欧洲学术竞争，陈独秀才在一个多世纪前呼吁：“吾宁忍过去国粹之消亡，而不忍现在及将来之民族，不适世界之生存而归消灭也”（4-5）。现在的中国，已经实现了适应“世界之生存”的愿望，但这一切（的实现）是以学术转型为根基的。

其次，今天提出话语体系的目的，与中国传统诗学不同。话语体系的用途是用来解释、评论文学，这就需要一个尺度。学者不必具备文学创作经验，其职责在于运用规范化的研究方法与工具，开展尽可能客观的测量与分析。尽管研究可能涉及情感与思想层面，学术考察的核心仍在于那些可重复、可验证的规律与现象。加拿大文学批评家弗莱（Northrop Frye）在《批评的解剖》（*Anatomy of Criticism*, 1957）中认为，诗人创造的作品，哪怕是理论性的，也只是批评家的材料。批评家比诗人更有资格评判诗人的作品，这种评判需要“特定的观念框架”（6）。通过他举出的归纳法，可知文学批评不是为了欣赏诗人的作品，而是用科学的方法来测量文学。拿自然主义文学来说，批评家的工作不是鉴赏，而是要研究小说对遗传、环境以及人的命运的思考，调查它们与当时的社会思想存在的关系，以及在写法上的新倾向。

如果说欧洲近现代学术存在实践者与观测者的距离，这种距离在中国传统学术中基本不存在。中国传统学术以人为本，它思考的中心是“如何做”。中国史学家优先要回答的问题是治乱之道，中国的哲学著作，例如《周易》，不是要分析阴阳此消彼长的决定力量，而是描述这个过程，寻找君子的应对之策。诗话也是如此。诗话偶尔也承担测量的工作，例如叶燮《原诗》中的体裁、格律的变化观，以及理、事、情的构成论，都有理论的品质。但是诗话

主要的作用，却不是研究诗，而是为了给学诗者指点迷津。进一步说，中国传统诗话的功能基本上不是解释、评论诗歌，而是直接用于创作。宋代许顛的《许彦周诗话》曾说：“诗话者，辨句法、备古今、纪盛德、录异事、正讹误也”（315）。“辨句法”与创作相关，诗话其他的方面，例如“纪盛德”“录异事”等，则是辑录与诗有关的逸闻。诗话原本并不与诗歌保持距离。因为着眼于此，所以中国诗文评（画论、书论亦然）讨论的话题具有经验性质，例如诗句中如何下字让境界全出，又如绘画中如何用烟云连绵让群山显出它们的意态。由此产生的诗学术语，多与具体的创作相关，多靠悟性把握，而缺乏科学的标准。以气韵为例，宋人韩拙的《山水纯全集》认为，绘画以气韵为首，有了气韵，自有形似。可是画中的“气韵”究竟是什么样的艺术特质，难以界定；而且同一幅画的气韵的有无或优劣，在不同的行家看来意见并不一致。今天构建话语体系，当然需要重视这类术语，不但用它来解释中国画，还要用它来研究西方画。如果用气韵来研究拉斐尔的画作，或者把它用到法国的十四行诗中，阐释的价值并不高。对于现在一些跨领域使用的中国传统话语，蒋承勇认为它们往往是“一种几无共鸣的‘话语’”（蒋承勇，“避免不同的‘失语’”51）。

话语的语境、功能的不同，是目前的话语构建活动面临的难题。这些难题是客观存在的，短时期内不易解决。而只要大的文化环境没有改变，回归传统话语体系就难以奏效。正是看到了“寻根论”的这种缺陷，蒋承勇才提出了他的“变体论”。

二、“变体论”在构建话语体系上的价值

“变体论”具有开放的文化意识和历史意识，它的目标是让话语体系的构建回到可靠的道路上。蒋承勇指出：“一味地固守传统、迷恋本土资源而忽略接纳优秀的外国文学知识话语和理论资源，又会导致另一种意义上的‘失语’——缺失了人类意识、偏离了人类文学知识谱系，使我们的文学知识话语窄化、弱化和贫化。于是也就很难与本土之外的世界文学对话，这将是另一种新的‘失语’”（蒋承勇，“避免不同的‘失语’”50）。从“变体论”出发构建话语体系有更大价值。

首先，“变体论”肯定了一个世纪以来学者们对中国话语体系的探索。话语体系的构建是一项严肃的理论活动。西学东渐以来，西方的话语不断进入中国，它们中有很多构成了现有话语体系的有效要素。例如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象征、隐喻、原型等。尽管学者的滥用也造成了术语上的混乱，但不能把责任归咎于这些术语本身。为了消化、借用这些术语，为了引入新的体系，不同时期的中国学者们付出了很大的努力。王国维就在化用外来资源上对后来的学术影响深远。以有我之境、无我之境来说，王国维使用不同的观物方式进行评判，将叔本华的意志主体与纯粹认识主体引入到中国词话中。罗

钢在这方面做了精细的分析，但是因为过分倡导原本的中国诗学，于是将王国维所做的中西融合的变体工作，视为自我阉割。他曾发出这种疑问：“经过‘现代化’和‘现代转换’的意境已经改变了自己的性质，改变了自己的诗学内涵，成为一个承接和容纳近代西方各种美学和文论的思想容器。在经过这样一番脱胎换骨的改造之后，它是否还能被视为一个中国的诗学观念，是否还能代表中国诗学在国际对话中发出自己的声音呢？”（376）引文中的“自己的声音”存在误解。自己的声音并非意味着严羽或者刘勰的声音。哪怕同是中国人，每一个学者都应该说出他自己的思考，不必重复古人。自己的声音不但要体现自身的文化传统，还要保持开放性。如果没有接受印度佛教的开放性，意境说又怎么会成为我们的诗学？从意境说的出现来看，它就是中外融合的产物。中国的古人因为具备开放性，而成功地造就了自己的话语体系，今天的学者们没有理由作茧自缚。

如果非要寻找自己的话语，那么汉代之后的大多数诗学概念都难以满足这个标准。不但中国是这样，欧洲的话语如果去掉阿拉伯、波斯、埃及、中国这些文化因素，大多数话语也不能满足欧洲自己的话语的标准。话语及其体系虽然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但在本质上它们就是变体，就像一切存在者都是此前存在之物的变体一样。变体说认为一个世纪以来的话语及其体系是有效的，王国维、朱光潜、叶维廉等人的工作是有价值的，而且需要我们作选择性的继承。话语体系构建不是一种虚无主义的破坏工作，它是积累性的，它的起点很早，清末、民初的诗学即为其开端。因而我们的话语体系构建不是从最近一些年才起步的，它早就走在路上。从时间起点来看，当前话语体系建设的理论，可分为旧起点说和新起点说。主张原样回归传统文学话语的，就是新起点说。对于这种学说，蒋承勇的“变体论”拥有更开阔的文化胸怀。

其次，“变体论”肯定中外文学话语相互交流中发生的变异。变异本身否定一个中心、一个固定的标准。无论是欧洲中心主义，还是中国中心主义，它们都固守一个不变的标准。将话语体系的构建理解为原样复活中国传统话语，本质上就是中国中心主义。需要看到，这种主义在晚清时期，就已经被打破了。晚清的羸弱有很多原因，既有外敌侵略的原因，也有自己不肯求变、不肯革新的原因。福泽谕吉（Yukichi Fukuzawa）在比较大清与日本学习西方文化的优劣时，曾认为：“日本和中国人呈现出这样显著的差别，原因大概在立国之本的差别，也可能在数千百年来的教育之中。虽然原因不止一个，但对于西洋文来说，一方是从内心出发变它化它，另一方则是流于表面，寻找近因”（49）。这种话难免有以偏概全的问题，但它在解释文明的生命力上则需要特别重视。没有变化的文明，注定将会衰落。变异本身意味着革新，意味着从旧的秩序中长出新的秩序来。大到一个文明，小到它的文学话语，都需要不断生长。回归传统的新起点说，否定话语体系的新变，它虚构一个原点，认为我们找对这个原点，真正理解它、守护它，话语体系的问题就迎刃

而解。这种观点与国外曾经出现的回归中世纪的乌托邦思想非常相像，不过，结局大都相似，最终多流于空谈。

蒋承勇相信话语、理论的变异中蕴含新的可能性，他认为：“要站在人类文明新形态建设的高度，坚持文明互鉴的基本原则，以积极、包容的姿态，认真考析各种理论和‘主义’的本原性特质及其在跨时空‘旅行’传播过程中的变异，发掘其合乎文学发展规律又切合本土文学与文化发展的合理因素”（蒋承勇，“避免不同的‘失语’”51）。20世纪中国学术采用的一些理论，已经不是国外原本的理论了，但这些理论在后来的运用中被证明具有解释力。例如，无意识在弗洛伊德、荣格的理论中，是未被激活的心理力量，它与人的本能密切相关，又限于本能。弗洛伊德认为那些意志的、信仰的心理力量也可以成为无意识：“自我和超我的很大部分内容可以保持不被意识到，一般来说是无意识性的。即是说，个人根本不知道它们的内容，如果要意识到它们，需要耗费精力”（Freud 69-70）。这种理论传到中国后，国人渐渐把无意识等同于性冲动，并将文学中无意识的分析等同于性心理的分析。无意识虽然经历过变异，与原本的理论有了一些出入，但也要看到变异让无意识的概念变得清晰、确定了。这就是理论变异后产生的现象，只要这种变异能促进学术的发展，就有它的积极价值。

当然，变异不但可以出现在外来话语上，也可以出现在中国传统话语中。传统话语经过与外来资源的融合，容易激发新的生命力。例如王阳明的“良知”，这原本是中国特有的概念，主要是在人性本善以及儒家伦理的背景中产生的。卢梭在《爱弥儿》（*Émile ou De l'éducation*, 1762）中，也提出过类似的概念——良心（conscience），但与王阳明的“良知”有不小区别。“良心”与人伦的关系不大，属于内在的判断力，甚至与社会正义有关系。随着外来思想的传入，中国文学和文化中所使用的“良知”概念已经偏向内在的判断力，与儒家的解释不同。这说明中国传统的话语具有与外来话语融合、变化的可行性。话语体系的“变体论”恰恰是在强调了本土传统重要性的同时，又强调以开放的姿态，让本土传统在外来文化养分的催化下蜕变为更有生命力的变体。

三、进一步的思考

蒋承勇的“变体论”将话语体系的构建从原样回归传统转移到文明交流互鉴上，在变化的视野中确定建设的方向¹，它具有救偏补弊的现实意义。利用这种新思维，话语体系构建的工作将会更有效，少走弯路。

话语体系构建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工作，站在今天这个时间点上，还不确定需要经过多少个时代，中国学者才能渐渐拥有相对完备的、具有文化自

1 参见 蒋承勇：“‘理论热’后理论的呼唤——现当代西方文论中国接受之再反思”，《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2018）：134-145。

信的话语体系。方向的寻找只是第一步，找好了方向，真正的突破需要细心与智慧。基于“变体论”的话语体系构建，最大的难处在于寻找中国传统话语体系与欧洲话语体系的结合点。这里说的不是结合，因为结合本身并不难，难在寻找恰当的结合点，以便生成恰当、和谐的新体系。真正有志于话语体系构建的学者人数本就不多，在这些人中，绝大多数要么知中不知西，要么知西不知中。知西的学者，不但要了解欧洲民族国家的现代文学，还要拥有较好的古希腊文、拉丁文的基础，另外，哲学、天主教神学、诗律学等素养也不可或缺。知中的学者，不但要熟悉诗话、词话，中国的儒学、佛学、其他诸子的学问、声韵学也是必备知识。这些学问掌握几个门类，已属难得，要想全部贯通，获得真见，现在或者未来的学者中很少有人能做到。如果真有几个学者找到了合适的结合点，核定了某种话语体系，学者们是否愿意改用新话语体系，放弃他们已经轻车熟路的旧体系，这也是问题。

话语体系的构建有它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但这是一项极其庞大的工程，虽然这个工程已经打下了一些地基，但是它的上层建筑还未真正设计好，我们今天讨论“变体论”的意义，就在于加速它的设计。鉴于这一工程的庞大，这里对未来的工作不妨进行一些设想。话语体系的构建若想取得成功，可能面临两个选项。第一个选项是自觉的做法，即国家设立一个学科或研究机构，通过集体的力量推动这一事业，而非单靠个别学者的兴趣来推动、确立并最终推广。第二个选项，是自发的做法，虽然可以呼吁人们参与话语构建活动，但无需急于求成，让历史逐渐积淀，最终实现目标。至于这两个选择哪个更为稳妥，则需交由历史来评判。

Works Cited

- Braudel, Fernand. "History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Review* 2 (2009): 171-203.
- 陈独秀：“敬告青年”，《独秀文存》第1册。北京：外文出版社，2013年。
- [Chen Duxiu: "Address to the Youth." *Collected Works of Duxiu* Vol. 1.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2013.]
- Freud, Sigmund. "The Dissection of the Psychical Personality." *The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 Vol. 22. London: The Hogarth Press, 1964.
- Frye, Northrop. *Anatomy of Criticism*. Princeton: Princeton UP, 1971.
- 福澤諭吉：「支那風擯斥す可し」，『福澤諭吉全集』第10卷，慶應義塾編。東京：岩波書店，1960年。
- [Fukuzawa, Yukichi. "Chinese Customs Should Be Abolished." *The Complete Works of Fukuzawa Yukichi* Vol. 10, edited by Keio Gijuku. Tokyo: Iwanami Shoten, 1960.]
- 蒋承勇：“避免不同的“失语”——文明互鉴与文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外国文学研究》3（2025）：46-51。
- [Jiang Chengyong. "Avoiding Different Forms of 'Aphasia': Civilizational Mutual Learning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n Independent Literary Intellectual System.”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3 (2025): 46-51.]

——：“‘理论热’后理论的呼唤——现当代西方文论中国接受之再反思”，《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2018）：134-145。

[—.“Calling for Theory after ‘Theory Heat’: Reflection on the Reception of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Western Literary Theories in China.” *Journal of Zhejiang University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1 (2018): 134-145.]

李建盛：“‘以意逆志’诗学命题的诠释学探讨：从汉代理解到当代阐释”，《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学报》5（2023）：52-71。

[Li Jiansheng. “A Hermeneutic Approach to the Poetic Proposition of ‘Yi Yi Ni Zhi’: From Han Dynasty Understanding to Contemporary Interpretation.” *Journal of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5 (2023): 52-71.]

李思屈：《中国诗学话语》。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

[Li Siqu. *Chinese Poetic Discourse*. Chengdu: Sichu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99.]

罗钢：《传统的幻象：跨文化语境中的王国维诗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

[Luo Gang. *The Illusion of Tradition: Wang Guowei’s Poetics in a Cross-Cultural Context*.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2015.]

许顛：“许彦周诗话”，《丛书集成新编》第78册。中国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年。

[Xu Yi. “Xu Yanzhou’s Remarks on Poetry.” *New Compilation of Collectanea* Vol. 78. Chinese Taipei: Xinwenfeng Publishing Company, 1985.]